

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李慧若

内容提要 巴以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建设定居点，不断侵占巴勒斯坦的生存空间。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持续建设定居点，可谓具有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的一般掠夺性特征。但与其他殖民者通过剥削原住民谋求经济与政治利益不同，以色列定居殖民的机制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下，资本垄断者同右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推动定居点扩张，以期通过土地私有化重构地缘政治格局。换言之，资本增殖需求构成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持续扩张的核心动力，资本在巴以问题中获得了超越国家界限的权力。以色列借助土地法律和国际经贸协议等工具，侵蚀巴勒斯坦的领土和经济主权，系统性地削弱了巴勒斯坦的自主发展能力。由此观之，巴以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争端，更是全球资本运动的局部表征。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定居点创造了新的阶级，巴、以工人阶级共同成为该垄断结构中的被剥削者。唯有打破资本垄断、重构阶级联盟，方能探索巴以问题的真正出路。

关键词 巴以问题 定居者殖民主义 以色列定居点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 私有化

作者简介 李慧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3 年 10 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巴以问题和以色列定居点议题的关注，尤其是以色列政府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批准了“EI 区”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发展”资助计划（DF2023YS46）的阶段性成果。

定居点建设计划。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不断侵占巴勒斯坦领土是巴以冲突螺旋式升级的主要原因。定居点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为代表的犹太人宗教群体开始在1967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停战协议分界线以外的地区建设居住社区。自此，建设定居点成为损害巴勒斯坦人民权益的侵占行为，同时也削弱了以色列的国家合法性。以色列的领土扩张瓦解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治理效能，是促使加沙地方政权走向激进化的重要外因。国际社会虽长期呼吁“两国方案”，但以色列以定居点的模式进行的殖民扩张始终没有停止。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色列执念于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其内在经济、社会基础与政治、宗教上层建筑间如何相互联动且形成新变量，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定居点指以色列政府、军方和宗教极端组织通过暴力侵占、购买或直接开发建设房屋的形式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但仍有深化的学术空间。

(一) 以色列定居点问题研究现状

关于以色列缘何建设定居点，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宗教和历史原因加以阐释。在国外学者中，历史学家迈克尔·费奇(Michael Feige)将信仰者集团定义为“带有某种弥赛亚主义和极端右翼政治观点的宗教极端运动”^①。历史学家艾维艾泽尔·拉维茨基(Aviezer Ravitzky)对弥赛亚主义、复国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系统性论述。^②哲学家、史学家约瑟夫·耶路撒勒米(Yosef Yerushalmi)在《坠落的犹太人的信仰》一书中，指出了犹太历史与弥赛亚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性。^③国内学者也对信仰者集团和犹太定居点问题进行了介述。欧振华、傅有德的合著《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宗教—政治定居点问题研究》一文，从信仰者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宗教精神支撑、定居

^① Michael Feige, *Settling in the Hearts: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Aviezer Ravitzky, *Messianism, Zionism, and Jewish Religious Radic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③ Yosef Hayim Yerushalmi. *The Faith of Fallen Jews: Yosef Hayim Yerushalmi and the Writing of Jewish History*. Waltha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运动的主要特征三方面，论述了信仰者集团的思想渊源、政治社会根源和激进的定居活动。^① 李根、罗安澧等研究者对定居点活动模式进行了研究。^②

随着后殖民主义、全球化思潮不断发展，定居者殖民主义 (settler colonialism)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定居者殖民主义指国家或非国家体为了扩张本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进行的系统性土地侵占活动。其中，“发展空间”既包括地理维度的发展，也包括市场、金融、文化等非实体维度的发展；“侵占活动”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暴力驱逐原住民、购买土地等各种途径吞并土地。与定居者殖民主义相关的理论起始于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乔治·布兰迪尔 (George Balandier)，他最早在其开创性的文章《殖民的情境：理论方法》中描述了“殖民情境”：“由少数外来族裔对占人口多数的本土居民施行的统治，该少数族裔以文化或种族优越感的名义施加控制。”^③ 上述关于殖民情境的描述至今依然对学界界定定居者殖民主义概念具有启发性。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费德里科逊 (George Fredrickson) 将殖民主义分类为“占领殖民”“种植园殖民”“混合殖民”和“定居者殖民”。^④ 1998 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沃菲 (Patrick Wolfe) 对定居性殖民点 (colonies of settlement) 与传统剥削性殖民点 (colonies of exploitation) 的区别做出界定。^⑤ 历史学家洛伦佐·维拉茨尼 (Lorenzo Veracini) 在《定居者殖民主义：理论概览》一书中，从人口、政权、观念与叙事 4 个维度对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跨民族、全球性的现象。^⑥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从宗教或历史角度梳理定居点的根源，但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其存续并不断扩张的机理研究

① 欧振华、傅有德：《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宗教—政治定居点问题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122 ~ 130 页。

② 李根：《以色列信仰者集团及其定居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2023 年；罗安澧：《以色列军政互动模式初探—基于定居点政策分歧的历史性分析》，参见姜景奎主编：《区域国别学》，商务印书馆，2024 年版，第 53 ~ 80 页。

③ George Balandier, "The Colonial Situ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in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36.

④ George Fredrickson,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Overview",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Collective Degradation: Slave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2003.

⑤ Patrick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London: Cassell, 1999, p. 163.

⑥ Lorenzo Veracini, *Settler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Houndmills, Basingstoke, 2010.

相对不足；学界虽愈加重视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反思以色列国家建构这一重要议题，但大多基于宏观和比较研究视角，而对于以色列定居活动的特殊性挖掘不足。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的过程包括定居殖民，其国家主权维护和扩张的过程也涉及定居殖民。因此，本文将定居殖民研究的范畴延伸到国家政治经济内部，在融合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探究社会结构演变引发的新的扩张需求，也就是国家的殖民动机，以此进一步解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殖民定居的根源。

（二）以色列定居点研究中的问题困惑

如上所述，学界对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探讨存在两大分野：一是从宗教史视角追溯“信仰者集团”等极端右翼运动的根源；二是依托后殖民理论批判以色列的殖民属性。前者过度聚焦弥赛亚主义与复国思想的关联，后者则陷入“剥削—反抗”的简单叙事，均未触及定居点扩张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既有研究框架下，出现了两个传统理论未能解释的现象——“以色列异常现象”（Israel anomaly）。

一是以色列政府并未从占领定居点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占领巴勒斯坦的经济成本远大于收益。与直觉相悖的是，占领巴勒斯坦并未使以色列政府获得经济利益，反而消耗了以色列大量财力。以色列军事占领年均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2%~4.7%（2010~2016年），维持占领相关支出影响了以色列的经济稳定性，阻碍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服务、民生投资。^①以色列占领的经济负外部性可通过机会成本模型进一步验证。若将年均4%的国内生产总值军事支出转投民生领域，以色列基尼系数可降低0.15。^②为填补占领支出带来的财政亏空，以色列政府采取了牺牲公共福利、刺激资本市场的经济政策，使国内经济走上了“以社会福利换取领土扩张”的高风险道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2005年）后，沙龙—内塔尼亚胡政府开启了长期的财政紧缩政策。原本应该投入到学校、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公共福利的预算被大幅削减，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保障被大大削弱。

研究定居点问题的学者注意到了以色列占领的经济影响，并试图对定居

^①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达到300%；直到1990年，该数值仍然处于138.3%的高位。See Shlomo Swirski and Noga Dagan - Buzaglo, "The Occupation: Who Pays the Price?", Avda Center, 2017, p. 17.

^② Swirski, Shlomo, Ety Konor - Attia and Aviv Lieberman, "Israel: A Social Report 2017", Avda Center, 2018.

者殖民主义理论进行建设性的阐释和补充。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阿米拉·哈斯 (Amira Hass) 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情况进行了长达 30 年的报道, 详细披露了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勒斯坦经济造成的破坏。哈斯认为, 以色列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占领巴勒斯坦、剥削本地廉价劳动力。^① 虽然到以色列务工的巴勒斯坦人收入较低, 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确实被以色列资本市场剥削, 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并不构成巴勒斯坦劳动人口的主流, 其经济状况也不能概括为巴以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 更不能被直接关联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意图。在哈斯的影响之下, 研究者开始以经济视角来观察巴以问题, 以色列左翼知识分子也遂采用“以色列剥削巴勒斯坦”的叙事。^② 这种叙事虽具有道德批判力, 但在学术上这种观点易使关于巴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落入简单化的窠臼。“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 从而获取经济剩余价值”的误区使我们对以色列的殖民扩张的性质产生误判。

二是以色列的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国家右翼势力侵占巴勒斯坦的成本, 却依然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由于以色列政府缩减社会福利支出, 以色列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首当其冲受到了损害。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 以色列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利库德 (Likud) 政府为了保住国际信用评级^③、减轻政府的还债压力, 采取了大幅降息政策。2006 年, 以色列政府的外债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5.09% 降至 3.33%。^④ 政府的降息

^① Amira Hass, “Are The Occupied Protecting The Occupier?”, in Roane Carey and Jonathan Shainin edited, *The Other Israel; Voices of refusal and dissent*,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pp. 162 - 164; Amira Hass, “Israel’s Closure Policy: An Ineffectiv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nd Repression”, *Journal of Palestinian Studies*, Vol. 31, No. 3, Spring, 2002, pp. 5 - 20.

^② 半岛电视台的专栏作家马尔文·比沙拉 (Marwan Bishara)、巴勒斯坦记者杰克·鲍尔 (Jake Bower) 等开始用经济剥削视角撰写社会评论, see Marwan Bishara, *Palestine/Israel: Peace or Aparthei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2001, pp. 43, 139; Jake Bower, “Why It Rains: Hamas Holding ‘Israeli’ Gas Reserves Hostage”,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v2/article4909.shtml?url, 2024-06-25>.

^③ 以色列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匮乏、土地狭小、高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的经济体, 将高新技术、创新市场经济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以色列政府非常看重信用评级的结果, 尤其由标普 (Poor’s)、穆迪 (Moody’s)、和惠誉国际 (Fitch) 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每年针对各个国家形成的投资信用评级报告。

^④ 这种政策倾斜也获得了积极成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以色列落地生根以来, 以色列的私有化投资、市场化创新蓬勃发展。以色列初创企业占人口的比例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使以色列在 21 世纪初获得了“创业的国度”的美誉, 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 同时以色列公司也大量在海外证券交易市场上市。

政策对改善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没有太大帮助，反而给高收入人群以及资本集团带来巨大利好，以色列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① 在以色列的民主政治体制下，中低收入群体应是对政府占领巴勒斯坦的反对者。然而，投票统计显示，以色列中低收入人群不愿意投票给那些致力于停止占领土地、重新分配社会公共资源的政党，反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占较高地位的高水平中产阶级犹太人倾向于国家从被占领土上撤军。^② 在以色列大选中，支持者收入最低的是支持定居点的沙斯党（Shas），其次是托拉犹太联盟（Torah Judaism）和利库德集团。^③ 虽然以色列社会底层受占领行为的冲击最大，但他们却是定居点建设的坚实拥趸。

以上两个“异常现象”均是传统关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说明定居点扩张的动因并非仅是政府的需要或者极端宗教势力对土地的狂热，由此促使我们探寻定居点扩张的深层动因。譬如，丹尼尔·古特温（Daniel Gutwein）认为，以色列右翼政府的相关政策虽然损坏了福利国家制度，但在其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享有大量政府资金的福利社会，给负担不起在以色列大城市生活的穷人提供了栖息所。^④ 上述分析显然过度浪漫化，但是古特温的发现表明，政府对基本生产资料（住房、土地）的重新配置改变了民众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为后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定居点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辛普松·比赫勒（Shimshon Bichler）和约纳坦·尼赞（Jonathan Nitzan）基于对以色列殖民问题的长期研究，认为资本可被视作对一部分社会产品、服务以及其政治属性的控制权。^⑤ 在此视域下，资本通过影响和控制以色列的国家暴力机器，重新确立了民众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资本和政治形成两套互相矛盾而又共存的体系，民主政治不再是以色列政治的唯一逻辑。

① 以色列政府不再补贴低收入人群，高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更多地聚集于高收入的产业。

② Shir Hever, “On Economic Class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Israel”,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alternativenews.org/news/_english/_on-economic-class-andpolitical-choice-in-israel-20080414.html, 2008-04-14.

③ Or Anabi,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Voters”, 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https://en.idi.org.il/articles/39409>, 2022-08-01.

④ Daniel Gutwein, “Some Comments on the Class Foundations of the Occupation”, *Teoria ve-Bikoret*, Vol 24, 2004, pp. 203-322.

⑤ Shimshon Bichler and Jonathan Nitzan, *From War Profits to Peace Divide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 Jerusalem: Carmel, 2001.

（三）以色列定居点研究的新探索

以色列侵占和管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行为，有许多做法与传统帝国主义殖民和种族隔离行为相类似，如对巴勒斯坦土地进行分割、限制巴勒斯坦人活动范围等。与此同时，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反抗运动的纲领也与反殖民语境高度关联，这导致学术界对于巴以问题的批评大多被直接简单归类到了殖民与反殖民叙事当中。因此，国际社会批评以色列定居点的声音多数将其归类为“殖民主义”，诸多学者也将以色列和南非的种族隔离进行比较。^①事实上，与传统剥削性殖民不同，以色列定居殖民的核心矛盾在于空间置换而非劳动力榨取，其目标是通过土地私有化来重构地缘政治格局。“复国主义的目标并不是剥削本地人，而是替代他们”。^②这指出了学界目前针对定居点研究中的一个盲区。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多数批评者不得不承认，以色列在国家层面没有从剥削巴勒斯坦人中获得经济利益。传统的批判者仅仅从政治层面批评巴以冲突的成因，而对于“以色列在经济上剥削巴勒斯坦”这一失据论点认知不足。因此，修正对以色列殖民扩张的研究，学界需要突破现有方法的局限，以期更透彻地理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学动因。

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主义不同于传统帝国殖民主义，也不同于南非的种族隔离行为。巴勒斯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贾米尔·希拉勒（Jamil Hilal）认为，有别于白人种族主义致力于剥削南非本土黑人劳动力的殖民主义行为目标，复国主义殖民者是为了在巴勒斯坦重新创造一个犹太人的劳动阶级。^③洛伦佐·维拉茨尼和帕特里克·沃菲指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没有直接获得利益，因为以色列定居者所渴望的资本其实是土地本身^④，同时，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基因蕴含着犹太人对土地开垦和建设的渴望。沃菲观察到，定居者殖民活动是体系化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一系列消除本土人口的活动，“殖民

① 一些学者针对以色列的国际禁运、撤资、制裁运动（BDS Movement），也直接将“以色列是种族隔离国家”作为宣传措辞。

② Jamil Hilal, “Imperialism And Settler - Colonialism in West Asia: Israel and The Arab Palestinian Struggle”, *Utafiti Journal*, Vol. 1, No. 1, 1976, p. 53.

③ Ibid.

④ Lorenzo Veracini, *Settler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0; Patrick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者的到来是为了留下——侵略是一个结构化的体系，并非一个单一事件”。^①打破对定居点殖民主义孤立性的认识，建立对定居者殖民主义历史过程、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架构，对深化解读以色列扩张行为十分重要。鉴此，本文遵循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将全球化、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纳入解读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的范畴（参见表1）。

表1 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的框架比较

	帕特里克·沃菲	洛伦佐·维拉茨尼	本研究
殖民目标	土地占有	人口置换	空间资本化
动力机制	消除原住民	主权叙事建构	新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耦合
分析方法	历史人类学	比较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以色列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学机理

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积累和殖民掠夺的新解读，资本主义空间再生产机制导致巴、以权力出现结构性失衡。在传统的殖民主义剥削机制基础上，资本扩张在巴以问题中产生了新的权力形态，具体表现为宗教、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等多因素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结构性侵占。

（一）私有化：定居点扩张的引擎

认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结构性侵占的一个关键突破点是定居点的私有化问题。2025年2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将加沙描述为“一个地产项目”，称“美国将慢慢占有加沙地区。”^②此番看似荒谬的表述恰恰言中以色列定居扩张的资本化和私有化现象。

以色列的私有化政策始于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与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同步发展。1985年，以色列政府通过了《经济紧急稳定计划》，新自由主

^① Patrick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An Ethnographic Event*, p. 163.

^② Betsy Klein and Irene Nasser, “Trump Describes Gaza as a ‘Big Real Estate Site’ as He Doubles Down on Plans to Redevelop the Enclave”,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09/politics/trump-gaza-real-estate/index.html>, 2025-02-09.

义成为利库德集团和工党之间的共识。从此，以色列不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执政，均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以色列政府的福利政策由于战争等因素不断萎缩，历届政府都面临财政紧缩、无力继续承担低收入人群住房建设的问题，由此推进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① 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政府的鼓励下迅速发展，本应由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开始大量被私人公司接管。1977 年，以色列启动定居点私有化政策，政府采用土地低价转让与开发补贴双重激励，催生了以地产资本为主导的空间商品化进程。在此背景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以色列政府开始用便宜的住房以及对搬到西岸地区居民提供补贴的方式来弥补国家福利政策的不足，加上信仰者集团等宗教运动的推动，搬往西岸地区定居点居住的以色列人口数量开始逐渐增加。^②

定居点房价的洼地效应形成资本扩张的引力场。世俗和宗教集团的开发商以几乎无土地成本的低价，吸引了靠微薄补贴生活的正统宗教人士，以及部分米兹拉希东方犹太人^③来此定居，并形成新的社群。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购买定居点的房屋成为一种比其他方式更安全的投资，使收入相对较低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开始选择在定居点购买房产，甚至生活在以色列大城市的高收入投资者也将定居点的不动产当作快速增长的投资领域。上述情况导致定居点的房价迅速上涨，2000 ~ 2018 年间，奥弗拉（Ofra）地区独栋楼房价格指数飙升 212%。^④ 尽管如此，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数据，2022 年，西岸定居点房价仅为特拉维夫的 5%。特拉维夫的一套三居室公寓最低售价为 125 万美金；在物价相对较低的小城市，如巴特亚姆（Bat Yam），同样

① Shlomo Swirski and Noga Dagan – Buzaglo, “The Occupation: Who Pays the Price?”, Avda Center, 2017, p. 25; 1996 年，内塔尼亚胡宣称：“我们要大跨步地进行自由化、宽松化和私有化改革”，see “Benjamin Netanyahu, Interview on World Business This Week”, CNN, 16 November 1996.

② 定居点大规模扩张的另一个主要背景是以色列人口的快速增长。自 2000 年以来，以色列出生率高居 2% 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3 个孩子，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尤其是正统宗教社群（ultra – Orthodox Jews）生育率极高，平均每个女性生育 6.6 个孩子，使宗教群体人口爆发式增长。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有限的国土面积使住房问题日益严峻，扩张定居点成为最便捷的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See “Israel’s Birth Rate Remains Highest in OECD y Far, at 2.9 Children Per Woman”, *Times of Israe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birth-rate-remains-highest-in-oecd-by-far-at-2-9-children-per-woman>, 2024 – 06 – 25.

③ 以色列建国初期，从伊朗、伊拉克等非欧洲国家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

④ Ben Sales, “West Bank settlements’ house prices go through the roof”, <https://www.sajr.co.za/west-bank-settlements-house-prices-go-through-the-roof>, 2024 – 06 – 20.

的一套公寓售价也达到 55.7 万美元。而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一套 250 平方米的公寓只需要 6.3 万美金。^① 显而易见，西岸房地产市场有巨大的空白和增长空间，因此，在吸引刚需居住者之外，定居点也吸引了有改善住房需求的以色列居民和投资者。

自此，定居点对于以色列经济的作用不再囿于居住需求，而是成为以色列社会资本扩张的引擎。同许多国家一样，以色列的房地产市场是类似于股市的经济“蓄水池”，可以提振国民经济信心，拉动投资和消费。但同时，资本必须通过扩张而生存，资本发展的本质就是押注未来的扩张。因此，定居点建设不仅要满足居住者的需求，更要满足投资者和开发者对其不断扩张与增值的需求。定居点地产开发一旦停止，以色列的市场经济就会受到直接影响。定居点从宗教飞地蜕变为资本的增值工具。在此背景下，不管以色列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左翼还是右翼政府，都已经无法阻止西岸定居点的扩建，因为定居点扩建已经搭上了资本的“列车”，一旦启动则无法停止。

（二）法律和贸易体系：维护资本垄断的工具

定居点私有化是以色列资本入侵巴勒斯坦的契机和桥梁。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资本不仅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资源，更通过法律体系、经贸条约等一系列制度规则对巴勒斯坦的资源 and 经济进行系统性掠夺，使殖民制度进入到巴勒斯坦社会内部，遏制了巴勒斯坦自主发展的再生产能力，使其失去建立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基础。

一方面，以色列通过一套复杂法律体系维护其强占巴勒斯坦土地、定居点扩张等个人和国家行为。人类学青年学者赵萱在《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之间的民族志》中观察到法律机器在巴以土地流转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他在田野调查报告中讲述了一个“好人亚金的故事”：巴勒斯坦人亚金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并在此定居。然而在 1994 年，以色列政府突然通知亚金该地需要办理房产证，于是亚金在漫长的办理过程中屡次被罚款，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借贷。亚金的邻居因不愿意交罚款而被迫搬离，房屋被政府强拆，土地被以色列政府没收。^② 赵萱指出，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这自然是一个以色列政府巧取豪夺的故事；但如果从以色列基于现代国

^① Tal Schneider, “Lured by Cheap Prices and Luxury Digs, Arab Israelis Are Snapping up West Bank Homes”,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5, 2022.

^② 赵萱著：《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商务印书馆，2023 版，第 331 ~ 338 页。

家治理的角度看，对该土地办理房产证是现代国家以司法管理的方式实现领土与人口治理的基本方法。^① 该案例是一个缩影，反映了以色列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司法体系为工具，在国家暴力机器的保障下控制现代产权的解释权，最终以经济手段购买、政治手段吞并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 1950 年颁布的《缺席者财产法》将巴勒斯坦人未实际居住的土地划归以色列国有；1980 年颁布的《耶路撒冷法》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包括 1967 年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其“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2017 年的《正规化法》允许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合法化”为犹太人定居点，虽然此法案后来被以色列最高法院部分冻结，但体现了议会对侵占行为的默许态度。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以色列法制体系，通过产权制度设计强化了资本集团利益，且成为霸权国制度性剥削被占领国的精密机器。当资本主义法律成为巴以之间的法则，国家主权的边界变得模糊，国家开始服务于资本利益而非民族利益。新自由主义司法体系为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设置了难以突破的障碍，也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民主政治。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贸条约将巴勒斯坦置于巴以经济关系的绝对弱势。《奥斯陆协议》（1993 年）及其相关巴勒斯坦建国方针从“经济和平”入手，其目标是实现“巴以共同发展”。譬如，1994 年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的《经济关系条例》（Protocol on Economic Relations）强调了对双方市场化经济的保护。^② 然而，在以色列资本明显处于强势的前提下，保护双方互通市场开放、“平等”贸易相当于给强势者施加了更多保护。该条例首要强调的是确保公共安全和遵守法律，而以色列将这两方面条件设置为限制巴勒斯坦发展的障碍：如果巴勒斯坦无法保障边境安全，即对以色列的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就被视为不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法规。由此，以色列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绝对控制。

遗憾的是，巴勒斯坦当局也妥协于新自由主义，奉行“市场优先”策略，放任资本垄断本土产业，导致民生凋敝、抵抗力量极端化。巴勒斯坦建国计划以及其中包含的“2008 巴勒斯坦改革发展计划”，完全执行以市场为中心、

^① 赵萱著：《耶路撒冷以东：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第 338 页。

^② “Gaza - Jericho Agreement: Protocol on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P. L. O., Represent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aris, April 29, 1994, see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information-document/ParisProtocol_en.pdf, 2025-02-08.

减少政府干预为原则的“华盛顿共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初期，巴解组织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确一度出现了由第三产业带动的快速经济增长，但不久后大家族腐败和垄断效应开始显现。巴勒斯坦政府放任私人公司垄断利益链，使本土无法发展出健全的产业体系，无法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华盛顿共识”的逻辑是促进福利国家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对个体的支持，然而对于经济落后、政治建设一片空白且未建国的巴勒斯坦来说，“放任鼓励”个体与市场“自由生长”无异于将中低收入民众置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体系当中。

三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巴以社会结构的再认识

通过分析以色列定居点的私有化问题、解读资本主义系统性侵蚀巴勒斯坦生存空间的机制，可以认识到资本增殖需求构成定居者殖民主义持续扩张的核心动力，资本在巴以问题中获得了超越国家界限的权力。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资本、宗教、社会文化都可能获得政治力量，成为强化霸权垄断的工具。在该体系中，巴、以两国的国界被模糊化，整个社会成为被垄断者主导的整体，上层是以色列的资本控制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底层被剥削的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低收入劳动阶级，定居点则成为垄断势力由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渗透的具象化的“中间地带”。

（一）顶层垄断者：以色列的两个1%

新自由主义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市场，并鼓励政府推进市场自由化进程。在这里，“市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广义的竞争和交易的场所，包括物质、观念、宗教等进行交换和竞争的空间。而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国防、经济的全面控制，巴勒斯坦社会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附庸。以色列的公民社会与资本市场融合、世俗与宗教社群并存，新自由主义使经济资本与宗教文化都获得了超越本身范畴的权力，成为整个巴、以社会的垄断势力，包括以色列的资本拥有者和极右翼犹太教定居者。

题为《占领对以色列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以色列占领定居点的经济模式类似于美国华尔街对资本市场的剥削，仅有1%的人从资本的扩张中获利，生活在特拉维夫的大约9万（正好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非常富有的人构成了这个群体。在财富的1%人群之外，以色列的极端宗教群体构成了国家的另一个1%。在该报告推出的2017年，6万~8万（也大约占

以色列总人口的 1%) 极端右翼宗教人士在犹大—撒玛利亚区建设定居点并居住。^① 这个占极少数人口的宗教群体占据了以色列宗教文化政治话语的制高点, 近年来, 他们在以色列政治决策中否决了各项从定居点撤离的决议。^② 犹太复国思想与以色列国的建立有深厚渊源, 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极易复苏, 使以色列随时有弥赛亚民族主义化的倾向。今天的以色列主流世俗社会虽然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 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冲击下, 世俗社会失去了统一的主流思想, 因此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抗衡。

以色列社会形成两大垄断集团: 占据财富顶端的资本精英, 他们通过地产与金融资本控制定居点经济; 极右翼宗教群体, 他们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裹挟政治议程。二者看似对立, 实则共享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扩张红利。这两个垄断集团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形成, 而新自由主义为二者提供了合谋的机会。其实, 以色列的世俗—宗教二元性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最主要的国家矛盾。社会学家尤里·拉姆 (Uri Ram) 在《以色列的全球化: 特拉维夫的麦当劳、耶路撒冷的圣战》一书中, 将世俗和宗教对以色列的割裂充分呈现出来: 以色列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矛盾的社会两极, 即一个是大都都会式的自由民主社会, 另一个是拒绝现代化的民族—宗教群体。^③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全球化给这个矛盾的两极创造了表面对抗、实则协作的空间。^④ 新自由主义使资本在以色列肆意发展, 侵蚀民主空间, 损害政治与道德, 押注宗教民族主义, 使两种互相矛盾的社会倾向形成了侵占巴勒斯坦、损害和平进程的合力。

(二) 底层被剥削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劳动阶层

新自由主义经济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劳动者同时成为被剥削阶级。前文

① 在犹太教弥赛亚思想的影响下, 狂热的右翼宗教人士认为, 只有在这些曾经属于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地方定居并复建以色列国, 犹太人的救赎才能完成, 弥赛亚救世主才能降临。

② 2005 年, 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从加沙地区全面撤军, 许多宗教定居者为了表示对此决议的抗议, 开始佩戴黄色大卫星标志。黄色大卫星是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被迫佩戴、用于区分犹太人身份的符号。在这些宗教定居者眼中, 尽管现代以色列国已经建成大半个世纪, 特拉维夫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 耶路撒冷已经有了以色列人的议会, 世俗的复国主义者仍然生活在黑暗当中。

③ Uri Ram, *The Globalization of Israel: McWorld in Tel Aviv, Jihad in Jerusal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④ 这种矛盾结合的制度根源是以色列没有宪法, 《独立宣言》被最高法院认定为“是国家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国家的每一个公共机构都应该遵守其原则”。这个定义规定了公民和公共部门的义务, 却没有规定私有部门、财团和资本的义务。宪法的缺失使资本在具有政治属性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空间登堂入室, 直接侵害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并且通过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价值观, 在个人利益和国家道义之间制造了巨大的盲区。

对“以色列异常现象”的分析中指出，以色列的减税是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进行的，大起义本身是巴勒斯坦底层民众抗议以色列挤压其生存空间而进行的反抗运动。在此情况下，减税反而使富人们免于承受阿拉伯大起义带来的财政压力，获得了度过困难时期的保护。^①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过去公有制的基布兹农庄、制造业等支柱产业私有化，引发物价上涨，使工会势力受到冲击，^②大量以色列民众和工人失去了生活保障。《奥斯陆协议》试图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巴以冲突，然而该协议造成了巴以社会阶层的彻底固化。因为《奥斯陆协议》之后，没有工会组织的巴勒斯坦廉价劳工得以进入以色列务工，以色列工人彻底失去了与资本家议价的空间。^③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使以色列工人与巴勒斯坦劳工同样成为被剥削阶级，使巴以社会矛盾成为资本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而不是单纯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政权对立。

（三）“中间地带”：定居点新空间

全球化发展到当今阶段，资本打破了国家的壁垒，直接影响每一个参与经济的个人。在以色列，即便一位生活在特拉维夫的公司经理反对右翼政府扩建定居点，他（或她）的收入增加也依赖于资本市场的扩张。即便左翼对定居者嗤之以鼻，每一个以色列公民都在这场资本运动中成为“同谋者”。超级全球市场形成了一个抽象的交易平台，资本交易的速度超出传统认知，使参与者没有兴趣了解自己参与的交易背后的影响。正如激进的墨西哥政治分析家拉斐尔·文森特（Rafael Sebastián Guillén Vicente）所言，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之下，全球金融市场的法规被强加于全世界，“全球化”无非是极权主义将其逻辑延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已。^④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思想维度^⑤看，以色列不断谋取巴勒斯坦领土的核心原因是新自由主义资本扩张的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① Shlomo Swirski and Noga Dagan - Buzaglo, “The Occupation: Who Pays the Price?”, Avda Center, 2017, p. 27.

② 赵丁琪、殷之光：《殷之光：巴以冲突、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殷之光》，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第47~54页。

③ 同上文。

④ Sous Commandant Marcos, “Sept pièces du puzzle néo-libéral: La quatrième guerre mondiale a commenc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1997, pp. 4-5.

⑤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空间理论的概念，但其思想中存在关于空间维度的思考。空间理论是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Henri Lefebvre) 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远程构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因为这是直接通过国家官僚主义的行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对空间所进行的管理……这一实践的一个根本的方面是,将空间进行分割,以使用来买卖(交易)”。^①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揭示了定居点作为“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的资本化表征,通过国家暴力与市场机制的共谋,完成了对巴勒斯坦“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的系统性消解。张一兵对空间理论做出具体诠释:“国家官僚主义直接控制空间的生产,目的就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变和幸存的新方式,这就是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和盘剥,在那些最不起眼、最普通的‘休闲、日常生活、居住与住宅、空间的利用’的近端构序之中。”^② 在新的共同空间下,资本主义通过影响生活方式、身份优越感、价值观等途径将原本的国家空间进行再造,并逐渐在该空间中形成阶级固化。这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的殖民者并不谋求剥削巴勒斯坦人,而是想替代或驱逐他们,其本质是因为资本需要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于“阶级意识”的形成的诠释同样可以解释定居点重塑巴以社会的过程。布迪厄继承韦伯的思想,认为阶级可以基于多个尺度;^③ 同时表明,经济可视作一个利益冲突发生的场域,并形成物质性、象征性、科学性或者宗教性的利益。^④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体现为财富重组,更是理论体系的置换,同时也是对于何为正确的经济理论、象征性财产的争夺。^⑤ 进而,布迪厄将空间概念引入到阶级中,认为空间也是创造阶级分化的因素之一。在此理论视角下,定居点的空间创造了巴、以新阶级:在“绿线”附近建造的一些高质量的定居点房价较高,社区配套完善,高质量建筑则会吸引许多中产阶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来此居住。以色列建筑学家加布里尔·施瓦克(Gabriel Schwake)从城郊类型学的视角研究发现,房地产商

① [法国]亨利·列斐伏尔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② 张一兵:《空间中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观念革命——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研究》,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1页。

③ Pierre Bourdieu,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4, No. 6, 1985, p. 724.

④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ichard Brown edit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56–68.

⑤ Pierre Bourdieu,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9–30.

不但开发该地的土地，并且逐渐获得了实际的土地规划权，同时宣扬一种基于更好的生活品质、私人的家庭生活和独立的社群的乡绅化（gentrification）生活方式。^①原先的巴以边界被改造为乡绅化的居所，资本在巴以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巴以共同空间”。在这里，民族之间、巴以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阶级之间的边界。新自由主义在此共同空间重新塑造了阶级格局，细化了阶级意涵，使身份认同、文化社会地位、消费方式等都变成了阶级的要素。居住在新空间的犹太人对定居者的身份更加认同，对定居点的政治冲突逐渐淡忘；甚至居住在此的巴勒斯坦人也逐渐被“同化”，更加认同在中产社区居住的生活方式。统计显示，为确保生活的稳定性，越来越多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巴以边境的巴勒斯坦人申请了以色列国籍。^②

在社会经济学的视角下，定居点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少的流动性阻碍的经济群体，也就是一个新的“阶级”。在这个阶级内部，资本跨越国家和政治体的边界，构建了新的阶级关系；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乡绅化生活方式并参与资本市场的阿拉伯人可能成为“剥削者”，而处于经济社会底层的以色列人可能入不敷出，成为被剥削者。高收入的劳动者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等各方面差异进行细分，以将某些劳动群体排除在高收入劳动者群体之外，确保自己的利益。^③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定居点社区的阶级固化同时象征着整个巴、以社会的阶级固化，使控制空间使用权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改变空间格局的意愿逐渐降低，停止定居点扩建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小。

四 余论：反思巴勒斯坦建国的困境与出路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定居者殖民问题，目的是以发展的眼光认识巴以问题的本质，在新的全球化阶段和时代挑战的背景下寻找解决巴以问题的有效路径。在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框架下，用经济方法赋能巴勒

① Gabriel Schwake, “The Bourgeoisification of The Green – Line: The New Israeli Middle – class And The Suburban Settlement”,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82, 2020, p. 82.

② 2019年，申请以色列国籍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达到了历史最高，为2372人。See Nir Hasson, “Just 5 Percent of E. Jerusalem Palestinians Have Received Israeli Citizenship Since 1967”, *Ha’aretz*, May 5, 2022.

③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7, No. 5, 1972, pp. 547, 583.

斯坦、重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关键。

（一）从定居点建设反思巴以冲突的症结

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时代，原本复杂的巴以冲突内在机制更加复杂化，阶级斗争间接化。资本打破了国家边界，民族问题掩盖了阶级问题，使同样属于被剥削阶层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劳动人民相互对立，无法团结一致捍卫阶级利益。新自由主义使每一个以色列人成为定居点殖民的“同谋者”，系统性地侵蚀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民主社会基础。以色列的殖民行为不但侵占压缩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更破坏和妨碍了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使财富向更加集中化的方向进行再分配^①，由此进一步拉大了有限财富总和下的贫富差距^②。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使巴勒斯坦置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被剥削的阶层。以色列政府利用精细的法律、金融经济工具以及文化和种族阶级政治，限制巴勒斯坦的自主发展，确保巴勒斯坦无法获得反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运动基础。

定居者殖民主义行为具有一般性殖民主义的掠夺性，但是其掠夺的机制是动态的，且会随着历史进程不断积累。虽然帝国主义殖民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但资本剥削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并且具有更加复合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用“剥夺性积累”表述当今世界仍然延续的资本掠夺和积累过程。哈维表示，惯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认为“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已经发生，^③并且如今的积累演进成在“和平、财产和平等”条件之下的扩大再生产（尽管是通过剥削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实现的）。^④传统认识下的殖民主义剥夺，即建立在掠夺、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被称为“原始阶段”，而这个阶段被认为已经是过去的历史。罗莎·卢森堡在《资

① Thorstein Veble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Peace and the Terms of Its Perpetu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7, p. 167.

② Shir Hever, *Political Economy of Israel's Occupation: Repression Beyond Exploitation*, Pluto Press, 2010, p. 142.

③ 哈维的发现继承了汉娜·阿伦特的思考。阿伦特提出，继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过程在通过帝国主义展现的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且持续的力量。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p. 28.

④ 哈维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设定是：自由运作的竞争性市场与私有财产的制度性安排、法理个人主义、契约自由、以及由“便利型”国家所保证的理性法律结构与统治结构，这种国家也保证了货币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和流通中介的完整性。这种设定认为“原始的”“最初的”积累已经发生，和当今的资本掠夺不可同日而语。参见戴维·哈维著，付克新译：《新帝国主义》，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本积累论》中发现的，资本积累（及其扩大再生产）不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实现，而是通过“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封闭系统实现。^①但其实，“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特征都还强有力地存在着。”哈维指出，“围绕剥夺性积累的斗争发生在各种环境之中，很多斗争都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还有一些是全球性的，这就使得控制国家机器……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②在巴以和平进程的困境中，我们看到其失败的关键恰恰在于国家机器的失效：巴解组织无力团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势力；哈马斯的抵抗走向极端化；而以色列民主政治也几乎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在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中不断损耗自身军事行为的合法性与国家形象。马克思主义分析证实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延展性，是检视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机制的有效方法。

如毛泽东所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③巴勒斯坦问题其实是一个更加宏观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与为资本服务的以色列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与以民族矛盾之名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工人阶级分裂开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而如今，以色列以及西方学界左翼将巴以冲突定位为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穆斯林）之间的民族与宗教冲突，而对阶级和资本问题置之不谈。^④由此，巴以问题被“政治化”或“内政化”。政治化批判的结果是用政治方法解决巴以问题，即将该地区分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两国方案。两国方案是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生存权、回归权的基础。然而，自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随着以色列领土的扩张，巴勒斯坦已经被蚕食成不连续的土地，无论是从领土连续性，还是人口发展的层面而言，其建国的领土基础都系统性地破坏了。因此，相关研究需要全面地考察两国方案这一政治提案背后所需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从而明确巴勒斯坦建国存在哪些

① 戴维·哈维著：《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第85页；罗莎·卢森堡著：《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二十六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913/index.htm>, 2025-02-09。

② 戴维·哈维著：《新帝国主义》，付克新译，第86页。

③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9页。

④ Oded Nir and Joel Wainwright, *Rethinking Israel and Palestine: Marx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8.

具体困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巴以冲突问题，不仅可以历史性地认识到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个具有延续性的系统过程，更关注到经济社会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梳理出巴勒斯坦建国方案难以实现的症结所在。

在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的局势之下，巴勒斯坦陷入“被掠夺—被援助”的循环。一面是以色列极力扼制巴勒斯坦建立自身独立的经济体系，另一面是国际社会源源不断地将援助物资运送到被封锁的巴勒斯坦和加沙领土。以色列表面上允许乃至协助外部社会对巴勒斯坦进行援助，表示出对平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但实际上强迫巴勒斯坦依赖外部单方面赠予，切断了巴勒斯坦与外部正常的交换和经济往来，贬低了巴勒斯坦劳动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价值，使国际社会不以一个有价值的经济体对待巴勒斯坦，将巴勒斯坦排除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禁锢了其独立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从政治上解决了犹太人的独立问题，但没有从经济上解决犹太国家的内部阶级问题。由于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势力垄断将巴勒斯坦人纳入了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之中，巴勒斯坦解放也缺少经济解决的路径和条件，因此，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缺少健全、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作为基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经济方法的缺位是政治方法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经济体系建设是巴勒斯坦建国政治框架确立后的必由之路。

（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之路

马克思曾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巴以问题，方能穿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巴以问题不仅是领土争端，更是全球资本运动的局部表征。巴勒斯坦建国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当今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实现这一路线需要妥善应对更复杂的挑战。解决巴以问题、赋能巴勒斯坦民族独立的关键在于，打破资本在巴、以社会创造的权力空间，建立与维护巴勒斯坦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巴勒斯坦当局首先需要团结劳动人民，树立其民族意识和阶级认同。其次，巴方应清楚认识到，依赖以色列的资本体系，发展附属于资本扩张的支持性产业，无异于继续强化垄断者的经济霸权，使巴勒斯坦人

^① Kail Marx,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p. 182.

民无法获得建国的经济基础。巴勒斯坦应将资源优先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保障基层民生的产业，强化国家政府对公共事业的干预和控制，确保经济发展服务于民族独立运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针对贫困问题提出权利理论，他指出，“拥有权”是一种基本权利，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① 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指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② 在巴以问题上，巴勒斯坦的经济问题、贫困问题经常被置于政治议程的边缘位置。然而，正如贫困对于一个社会中的穷人和富人都是—种威胁，巴勒斯坦及其加沙地区的贫困是巴以问题无法回归和平谈判正轨的主要障碍。因此，发展是巴勒斯坦走向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唯一路径，只有给予巴勒斯坦发展独立劳动经济、建设健全市场的空间和机会，才能让巴勒斯坦走出“被剥削—被同情—被援助”的循环，成长为健康发展的正常国家。各国应与联合国—道，构建“巴勒斯坦经济赋权路径”操作框架，具体操作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建立跨境劳工权益保护联盟，瓦解以方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垄断；长期推动“非对称经济去依附”（asymmetric de-linking），培育本土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等。

中国提出的“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不谋而合，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发展巴勒斯坦经济并非仅是道义所需，而是赋能巴勒斯坦的发展、切实确保巴以和平的根本方法。同时，巴勒斯坦内部团结是巴勒斯坦独立和建国的基础。《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2024年）的发布，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在中东的实践，更为国际社会认识巴以问题解决之道提供了更深刻的诠释。巴方唯有团结一致，逐步建立起自我赋能、独立发展的建国道路，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有自主性的一员，从而为巴以和平和中东长治久安提供保障。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史晓曦）

^① [印度] 阿马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 [印度] 阿马蒂亚·森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任曦、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